

创造与自由

——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反思

■董光壁

只有讲出真相才能使世界变好。
——欧文·查德威克(阿克顿教授)(1995年)

中国现代史实乃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从“师夷”开始，程序反演地模仿西洋。首先在器物层次，然后是制度层次，最后才进入思想层次。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草率地反演欧洲现代化的历史。这种程序倒置或许是一切后发国家不可避免的，但它所固有的不彻底性导致中国不得不程序紊乱地反复重演欧洲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主张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他的两个后继者则各有偏爱。蒋中正(1887-1975)的国民政府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1893-1976)的人民政府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还是在邓小平(1904-1997)首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回到了孙中山。

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属于工业文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历史，本质上是模仿源自欧洲的工业文明的历史。中国政坛领袖们所谓的“创造”，不过是对工业文明的选择性变通。而工业文明或现代化道路乃自由引导革命的成果，即平民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合对抗专制君主的结果。然而，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对待“自由”的态度，都是“欲迎还拒”。

自由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是法国思想家贡斯当(1767-1830)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1816年)，它区分了作为公民资格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私生活不受干涉的现代人的自由。真正的现代自由是个人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英国思想家密尔(1806-1873)以其《论自由》(1859年)最早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作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自由精神，即“由于自己”的解缚传统，但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概念则是舶来品。严复(1854-1921)的译著《群己权界论》(1903年)就是密尔的《论自由》的第一个中文版，书中《译凡例》对“群己权界”4个字的解释：“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是中国学者对现代“自由”概念的最初解读。

蔡元培(1868-1940)掌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新风。“五四”新文化运动锻炼了一代青年，《新青年》(1915-1922)、《每周评论》

(1918-1919)、《新潮》(1919-1922)、《努力周报》(1922-1923)和《现代评论》(1924-1928)等期刊培育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胡适(1891-1962)等人以《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与北洋政府的专制抗争。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月》(1928-1933)、《独立评论》(1932-1937)和《观察》(1946-1948)等刊物，彰显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在国民政府鼎盛时期的1930年代，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人权论集》(1930年)中胡适等人的呼唤，《伪自由书》(1933年)中鲁迅(1881-1936)的冷嘲热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1933)总干事杨杏佛(1893-1933)之被暗杀。

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之际，当政的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出版《中国之命运》(1943年)，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野的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要求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1945年)。偏寓海岛台湾的国民政府，被西方自由世界视为“自由中国”，却封杀了《自由中国》杂志(1949-1960)，但终究也还是不能长久阻挡自由化的历史进程。主宰大陆的人民政府，遵奉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曾固守“无产阶级专政”而忽视“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实乃“得也自由，失也自由”。28年的去自由化，去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去政治自由化，经济总量增长8倍和人均GDP年增长率2.3%是以忽视民生和损害自由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自由化，权力资本化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抑制政治自由化，经济总量又增长8倍和人均GDP年增长率6.6%，是以扩大贫富差距和忽视人权为代价的。

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没收官僚资本和粮食等物资的统购统销，以及没收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收归集体的合作化运

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这诸多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也控制了城乡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经济自由。中国共产党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化尝试，提倡学术自由的双方方针和鼓动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突然转变成去自由化的反右派政治斗争。北京大学的青年学子们的“社会主义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幻想落空了。

作为不断革命的第五阶段，继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私营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化、政治大跃进和思想战线的革命四个步骤之后的“技术革命”，大跃进以鼓动工农群众的政治热情推进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发展。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为标志的“解放”狂热，不仅进一步限制了人民群众的自由，而且领导工作的分歧也扩大为思想路线上的反右倾斗争。尽管大跃进的奋斗精神也取得了成绩，但3年跃进(1958-1960)导致的3年经济困难(1959-1961)，经过5年调整(1961-1965)才得以恢复，延宕中国现代化进程达8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的反自由化，把反右派和反右倾结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力与民众联盟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演习，促成新旧权贵们在“牛棚”里结成神圣同盟。文化大革命，革了商品经济的命，革了文化传统的命。

改革开放也是革命，通过产品的剪刀差、土地的剪刀差和权力资本化，扩大财产权范围和自由市场范围。1978年底，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秘密协议，几乎同时分别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拉开自由化革命的序幕。小岗村的经济自由化被认可，西单民主墙的政治自由化被否定。受农民的经济自由化的启发，经济特区诞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有企业改制。

“自由”这个高尚的字眼，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反对自由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就是贬义词。在学术界，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辩，使得本来已演化得纷繁复杂的“自由”概念变得更令人眼花缭乱。

自由、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消极



董光壁

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外在的自由与内在的自由、社会自由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立和融合，似乎建造了一座混沌不清的迷阵。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从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到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再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表现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动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

社会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被新自由主义取代的历史表明，调和工业文明两种社会制度的理论努力并不成功。依此推论新自由主义左派，如美国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1921-2002)和法国哲学家德沃金(1931-)，尽管他们的著作《正义论》(1971年)和《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2000年)颇有影响，但他们将平等渗入自由逻辑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

当代对“自由”理解的分歧可能表明，自由理论处在大变的前夜。从德国-美国思想家弗罗姆(1900-1980)的《逃避自由》(1941年)，到英国政治哲学家葛雷(1948-)《后自由主义》(1993年)，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诸多分析表明，自由主义理论需要进行一次大的变革，而对于理论发

展的方向却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理论总是在批判现实中曲折发展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轮回的中国现代社会，或许为发展普适的自由理论提供了条件。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努力方向大多跟随国际潮流，亦如从孙中山到邓小平的中国政治家们一样，在调和方向上思考问题。胡适早在1926年就同徐志摩(1897-1931)讨论过自由社会主义问题，他把避免阶级斗争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称作“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中国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在1948年曾明确提出兼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概念。当代法学家朱高正(1954-)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和互动理论，政治学家崔之元(1963-)推崇米德(1907-1995)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也都是试图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并已开始走向后工业文明时代。葛雷的后自由主义价值多元化提示值得重视，后自由主义的自由理论应该是引导人类走向后工业文明的理论。现在还没有谁说得准后工业文明什么样，但对于它如何形成却有史鉴启示。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文明起源的“挑战-应战”说和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1866-1946)文明演化的“冲突-融合”说，未来的后工业文明必定通过现在工业文明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明的耕织文化的融合产生出来。

在创造新文明的意义上，后自由主义的自由理论，可能由现代自由理论与中国传统的自由理论的融合形成，也就是说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自由概念。爱因斯坦在其《自由与科学》(1940年)的讲演中强调，“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曾为《自由中国》主笔的思想史家韦政通(1927-)和新自由主义大家哈耶克的学生林毓生(1934-)等人，或许沿他们所开辟的方向能发展出普适的自由理论。

创造是人类的使命，自由是理想的目标。中国尝试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充满创造的冲动和自由的困惑。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法国思想家
贡斯当



英国思想家
密尔



近代翻译家
严复



近代教育家
蔡元培



现代著名学者
胡适

城市化与启蒙

■宋俊岭 宋一然

城市问题扎堆而来，危及人的生存。各界话题聚焦于城市化和城市化，就不足为怪了。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是著名的城市理论家，被誉为人类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工业文明成熟时期，以人文主义原则精神，反思文明前进的方向性问题，开启了人类的生态文明前景。

他山之石，能否攻玉？

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现代化的双翼。近代史表明，工业化开始越晚的国家，城市化来势越迅猛，中国恰其典型。工业和城镇迅猛发展，让新世纪以来城市地区大气窒息、水源紧缺、交通阻塞、两极分化，人们道德滑坡，对正义缺位视而不见……中国城市化进程，尤在大都市，陷入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回望来路，乡村衰落、草场退化、河流干涸、农舍空巢、小城镇萎缩等迹象，也同时显现了。发达国家城市化高速时期曾有一切弊端，都提前降临。

上个世纪80年代，针对中国城市化战略抉择，曾有过一次思想“角斗”。对决双方皆著名学者，一方是社会学家(抑或文化人类学)主张的小城镇道路；另一方是宏观经济学代表的大都市道路。双方在著名学府同一座教学楼平台开打，各述理由。因种种复杂原因，经济学主张获胜。从那时起，中国城市化大步跨上大都市道路，发展旺盛，尤自90年代初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决策后，城市化迅猛，年均有近千万农民进城。粗略看，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85年约21%稳步升至1998年的30.40%。中国城市化进程从此突破第一临界点迅猛攀升。连续10年陡增近15个百分点，社会发育呈现出高活力、高速度、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明显特征。由于人口基数大、资源

相对紧缺，尤因认识模糊、政策滞后，前述各种弊端陆续出现。

在我国发生的，是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群落的城市化，是新世纪两件世界性大事之一。需密切观察，格外审慎，避免重复以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非理性状态。特殊国情决定了，理性、健全的城市化道路以及配套决策，只能从启蒙开始：大众的启蒙、启蒙者的启蒙、决策者的启蒙。就内容而言，首先有3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时代特征、城市化概念、中国特色。这些一再重复的语汇，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

回顾与重新思考

文明史上三次浪潮，第一次，农业革命，让城市诞生于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城市主宰了世界；第三次，信息革命，让城市……如何呢？这是我们观察现代世界，决定行止时要认清的首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观察世界我们看到了什么？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穿过第拉维尔河从东面进入费城，高高的铁桥上望见西岸绵延数公里的码头、仓库、火车站，空旷无人，密集的设施和机械都闲置不用了。这种景象，后来在俄勒冈州哥伦比亚河流沿岸港口城市波特兰再次见到。同样的景观和含义，在纽约州农田中表现为一处处中小型农舍和谷仓，粮食加工厂的大量闲置。这就是第三次浪潮给城市和大地景观带来的巨变。为什么？因为信息通达，构建了精准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物流网络，纽约城某地一年以后消费的香蕉，去年就已经纳入某亚热带国家香蕉种植园生产计划……周密计划让分散、配送取代了传统的大批量运输、集中、储存和周转，许多地区铁路、码头随之屈居次要地位。它表明，资源、人口和生产力的分散、合理配置，是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构成新时期世界大趋势。

深刻理解城市的重要性，需从城市从无到有的历程来深入考察。启蒙的含义在于：认识国情，认识自己。而且，要从人类何以诞生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自己。懂得为什么要尊重人类、尊重人民、尊重人权。

第二个问题：城市化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这个概念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人口向城镇地带集中的过程，表现为城镇数量增多以及城镇规模增大。也含有城镇地区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向非农领域转变。我国官方定义(草案)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渐演化为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文化、价值观和城市生活方式渐成主体，不断向农村扩散；也包括农村本身的逐步城市化。(见《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草案))。芒福德的主旨思想认为，城市化体现了人类从野性走向人性的文明历程。三种见解视角不同，各有千秋，都看看，都吸收，就有利于丰富理智、优化决策。

深刻理解城市的重要性，需从城市从无到有的历程来深入考察。为此，说到第三个启蒙内容：认识国情，认识自己。而且，要从人类何以诞生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自己。懂得为什么要尊重人类、尊重人民、尊重人权。

初步的调查和疑问

城市化十多年飞速发展效果之一，是我们周围布满了农民工：小商小贩、快递、运送、销售、保洁、保姆、保安、物资回收、扫街、装修物业、园林绿化，乃至白领、金领……笔者周围也是同样情况；而且长期密切接触之后，很想深入了解三个问题：他们进城的原因；进城后的感受；进城的长远打算。不幸，这样的大型调查，个人难以周详实施，却可以做抽样调查，获得大体印象。笔者获得的结果很有意思：大多数民工进城，迫于无奈。他们的典型说法是：“(在家乡)有办法谁来受这个罪？”至于家乡为什么“没办法”，则另外又是一项调查。对每年都准时公布的城市化年均进城人口

的统计数据，笔者素有保留：他们进得来，能否留得住？能留住的话，是否幸福？幸福的含义以及归宿，则还不敢深问。

不言而喻，这是城市化高速时期见到的初级城市化实情。但是，人之教化、走向文明人类和人类文明，不是大事吗？不是城市化的真义吗？有思索、有筹划吗？谁来负责推进呢？

回归理性价值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高速阶段又与人口峰值期重合。此局面不可掉以轻心。指导古老民族和文明走上现代世界舞台，该有哪些必要准备和调整？哪些事情该未雨绸缪？民间流传一首旧调新词的歌曲：祖国啊，你慢些走！其中慷慨咏叹，不无启发，似乎告诉我们，如今改革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谋制度创新，将一事无成。

不妨再看看芒福德是怎么说的：“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化有机的生命繁衍为社会创新。这都是城市能够发挥的积极功效。若没有制度创新，若不能首先有效支配、控制巨大权力和能量，城市这些积极功能就无从发挥。历史上，同样具有制度创新，然后，一些发展过头的大村落、堡垒、营寨才靠这些制度安排逐步转化为高度组织化的文明构造，让城市诞生于世。如今我们急需的同样是这种强大的制度安排。”

这段话的前三句，经上海世博会采用已广为流传。而人们在人云亦云称颂城市神奇功能的同时，少有人注意到作者着重要说的其实在后面。他强调：一切好东西，若离开制度创新，都会流产。我国当今的要害问题也正在这里。本文不嫌累赘引述这段话，就为了读者完整理解这个意思，而不要立足城市现状、一味统计进城农民总数而沾沾自喜。

我们的“首选物”曾经是“温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稳定”之类的目标。国情特殊，本无可厚非。而价值形态却从来是文明发育进程中最根本、最重要、最权威的动机和指南。回顾历史，若无数千年礼仪廉耻，忠孝仁爱做国人的四维，怎会有老舍笔下故都那“历代智慧与心血建成的湖山、宫殿、寺宇、宅院、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怀抱的古柏、倒垂的杨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花草……最清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缓慢的脚步与唱给宫廷的歌剧……”若无几千年的礼仪廉耻，怎会有以同仁堂为代表的职业操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若无数千年礼仪廉耻潜移默化，民众何能选择出如此鲜明稳定的道德认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故都北京又怎会有鲁迅笔下《一件小事》里车夫爱人胜于爱己的可贵自律？

是的，人类的城市化进程曾经产生过一系列优良城市。芒福德说：“如果说在过去许多世代里，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伦、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和伦敦，都曾经成功地主导过它们各自国家民族历史的话，那首先是因为这些大都城都始终能够成功地代表各自的民族历史文化，并将其绝大部分留传给后世。”正反两面实例都证明，一个社会若丧失共同的道德底线，必将堕落、溃败、无以自救。

理想，曾经是人类进化路上追求的目标和动力源。丧失理想意味着迷失，意味着堕落。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的崇高价值理念。鉴此，我们是否该考虑顺应世界文明潮流，推行普适价值，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来维护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环境，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保驾护航？

(宋俊岭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